

空間社會個例：深描、反思與想像

朱亞坤

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 “空間社會”是對地理大發現以來空間生產邏輯和空間意象之多元特性的一種概括或視角凝練。依此視角，本文進一步關注流動空間、凝化空間、居住空間、都市社會、全球社會和星際社會等空間社會個例，深描諸種個例的空間形式、現實樣態及行動邏輯，反思其間各種可能的空間構造和意象建構過程，由此對空間社會的內在性及其之於人類未來解放的意蘊展開想像，進而反向探析空間社會視角的積極意義和自我界限。

關鍵字 空間社會、空間形式、空間生產、空間意向

“空間社會”是對地理大發現以來空間生產邏輯和空間意象之多元特性的一種概括或視角凝練。¹ 從空間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走向實際空間變遷的經驗分析，即以個例呈現和分析入手展現空間社會的基本特性，這是空間社會視角深度回應時代問題並尋求解決性方案的重要基礎。當然，毫無疑義，任何一個時代尤其是當代人類的時空經驗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心理經驗或地理經驗。社會空間是由外部因素（即自然環境）和人類自身的因素（即生物的、技術的、文化的因素）共同決定的。而且，由於這些因素是變化的和發展的，所以從歷史上來看存在過一些不同形態的社會空間。人類社會劃分五種社會空間：初始空間、地方性空間、國家空間、全球化空間和資訊空間。² 與此觀點關聯又區別

的是，本文接下來主要通過思考一些具體或可能意義的個例來加深對空間社會的體察。我們將分別討論流動空間、凝化空間、居住空間、都市社會、全球社會和星際社會。這種考察並非意味著空間社會可能或者只在個例中得到呈現，而是相反，諸多個例就是空間社會理論整體考察的重要組成部分。誠然，每種個例或都有特別之處，正如哈維所言：“人類佔據地球表面以及嵌在不同地方中的社會形式（語言、政治機構、宗教價值和信仰）的非凡進化，這一長期的歷史地理創造了特別的社會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地理拼嵌圖。”³ 個例的生成一般都是歷史形成並在一定程度或者某些方面映襯空間社會的整體布展和演進特徵。我們除了深植這種特殊性的考察之外，還認為，抽象的共同性背後就是豐富多樣的歷史現實性。本文考察關注特殊性甚於共同性的抽取，因而是局部的努力，但更希望這種關注是具體、真實和富有延伸討論的價值。

一 流動空間

近代以來，伴隨著空間社會的深入布展，空間流動性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或結構化進程的重要特徵得以凸顯出來，逐步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生產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宏觀層面看，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重構當代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內容，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充分流動、湧動的世界，諸如人才、資源、資本、要素、技術等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不同區域、國家、城鎮乃至虛擬網絡上無時無刻不在流動，全球各地區之間業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高頻率互動的網絡，體現為城市網絡、資訊網絡、物流網絡、交通網絡等，既鱗次櫛比、各有其序，又錯位疊合、張弛相間。一方面，流動

成為當今時代最為顯著的一個特徵，彰顯流動性的流動空間也成為當代社會最具普遍的空間生成圖式。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

“在全球化對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當下，流動獲得了內涵和外延的立體化與多面性，各種類型的流動正表徵並重塑地方、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⁴ 另一方面，流動性帶來了空間的社會治理挑戰。“流動社會的來臨不僅在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地域社會的基礎構成，更是將流動性與地域性之間的關係問題推向了全球治理變革的前沿中心。”⁵ 流動空間既發展成為一種客觀的空間形態，又成為空間社會治理機制所力圖加以規範的物件。極目之處，我們不難發現，各種各樣的地方分層、場所變動、地理流動、社會流動、全球流動市場湧現當前，這也是卡斯特有關流動空間的相關論述得到多方面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的流動空間概念，更多是用以說明網絡社會的物質基礎，既是資本積累的方式，又是社會排斥的機制。⁶ 對宏觀層面的流動性、流動空間乃至流動社會的關注，學界已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接下來，我們嘗試通過微觀層面的流動空間例子來形象地說明並把握流動空間的相關特性，以豐富對流動空間的思考。這裡所謂流動空間，更多是指因社會目的、技術介質和自然資源的某種形式結合，以及因這種結合產生的空間配置機制形成並推動了一種暫時的空間承載或想像功能的攫取或轉移。值得注意的是，流動並不是與固定相對，而是說，一定容積的空間被固定在一種運動變化狀態之中，這就意味著流動空間是以固定空間配置為基礎。流動空間體現出人類生產能力和科技能力的發展水準，它不是新鮮的現時代產物，而是具有長遠的歷史積澱。

流動空間的一個很好例子就是列車空間。列車空間是現代交通工具不斷應用和發展的必然產物。自近代以來，火車的發明和鐵路的建造，兩者共同在交通工具行列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列車運行軌跡彰顯社會現代性流動及其程度。從社會學的角度來

看，列車空間的主要特徵可簡要概括為低密度人際交往、高密度社會控制。其一，所謂低密度人際交往，是說在列車空間中，不同乘客之間的人際交流頻率是極低的，甚至是零交際頻率。因為，流動空間的特質是功能空間或者消費空間，它是簡單而且是經濟朝向的，簡單就是功能單一，比如運載乘客到達預定地點，這個行動圖示非常明確；經濟，恰恰就是簡單承載功能的需要所指。比如在列車間這一流動空間中，人的吃喝行為是以一種簡便和休閒的方式進行，但這種方式可能是極奢侈也可能是極其簡單。也正是如此，流動空間是很少發生故事的地方，而一旦滋生事件或發生故事，就特別會吸引人們的關切，因為它的空間社會類型本來就屬於低密度的，一旦發生某種社會事件，就可能因此被放置於高密度的社會討論的場域中，從而可能激發紛繁複雜的社會評論。在這種討論情景中，表面上人們討論的是事件本身，而根本上卻是關於不同空間中社會事件能不能發生，以什麼樣的方式促進發生並呈現出什麼樣的結果等社會議題的植入。如果此類事件發生在高度人際關係網絡當中，很可能根本就不會被討論或被廣泛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控制反而也是以特殊處理的方式出現，但更多是偏移意義上符合虛化了的道德意蘊，道德意蘊甚於法律要求。其二，所謂高密度社會控制，在於流動空間本身是國家或地方政治權力和公共服務施展的場域。以高鐵為例，高鐵便利運行背後的是國家規劃和交通管制，是國家權力的日常運作，一方面權力保持了自身的優先性，另一方面權力的實施又保證了權力服務的公共性，問題不在於不同類型權力之間的衝突，而在於權力實施的實際效果就是權力本身的彰顯。權力在被認可和固化當中，即固化為固定的場所和機器及其實際運作形成的功能協調樣態，其自身得到了多維的施放和認肯。流動空間的社會學意義在於，這一空間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交往模式，這些交往模式乃是一個高度功能性的權力實施場域。

從上述微觀層面對流動空間特性的說明當中，我們極易感受到這麼一點：流動空間最有助於培育和見證公共性的增長或者衰落。因為，流動空間雖然是低密度人際交流，但是這種低密度確實是在考驗人的底線倫理操守水準，因為，流動空間中的人本身是一個孤獨者，人生就像旅客的哲學意義恰恰是反過來說，即：人生根本就不是旅客，但是在流動空間中永遠是旅客，也恰恰是暫時旅客的意義毫無疑問地降低了一個完整人的道德自我訴求，因為他在流動空間中的言行極有可能是排解孤獨本身的一種做法，僅僅是針對孤獨本身來理解的，也正是針對孤獨本身，使得人身上的社會要素釋放是從個人意義上遵行功能性的自我滿足需求，因而也就是針對低密度的自我道德定位要求。反過來，我們從公共性角度來考察，也恰恰是針對孤獨自我定位個體本身的管制、規訓和治理等過程，反映出我們整個社會公共性、公共服務的發育情況。因為，這個時候的制度設計和規則制定就是針對最低限度的要求，從這裡面不但可以看到孤獨個體自處可能要持有的規範，而且也可以看到公眾和政府關於如何使用權力的道德規範。

流動空間中最大的行動邏輯便是等待，等待什麼，為什麼等待，用什麼方式等待，誰在等待？這一系列頗為有趣的追問把等待這一社會行為本身作為一種反身性的哲學命題自然而然地提出來，或許，我們可能會陷入薩繆爾·貝克特所著《等待戈多》⁷的那種漫無目的和荒謬的哲學幻象之中，但是如果因之來循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組織的意蘊所在，首先，我們將看到的是，權力所要求的那種模糊而又精確的張力，因為等待的非預期要素介入是模糊所指，而期待準時准點又是精確要求，這種張力使我們探觸到了權力施行的可能界限，權力並不是福柯所言的無孔不入，無時不在。因為面對權力，權力普遍性可能忽視了主體的主動能力和空間客體化的自然特質。其次，我們看到，等待本

身超越了荒謬的孤獨自我，因為等待是有所期待，是為了實現流動，也是為了構建在流動空間實現與遙遠的他者及其關係的互動圖景的內在連續統。事實上，等待意味著某種被改變，等待同時也是生成性的歷史時間嵌入到廣延性的空間的明顯體現，這意味著在空間社會理論當中，儘管後現代性政治理論著重強調的是空間轉向及其政治意涵，但是截然兩立地說現代性意味著時間，後現代意味著空間主題，極有可能墮入簡單化的思想自畫，因為，等待就是時間嵌入和空間暫緩的一種矛盾式表達，矛盾本身表明的就是社會意涵的豐富和複雜所在。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所討論的微觀層面的流動空間，與卡斯特全球網絡社會視域下所謂的流動的空間是有不少區別的，前者強調微觀機制，而後者更強調資本邏輯的宏觀運作及其後果。不過，如果要從空間社會的虛擬式形態出發，我們不難發現，流動空間的擴展式和虛擬式表現就是全球的技术流動空間，其中常見的例子是股票交易市場以及各種金融產品交易場所或平臺。整個地球通過技術及其應用逐漸消弭了空間的物理差距，這一過程還在持續進行當中，但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全球城市、全球村等耳熟能詳的話語充斥在全球大眾的眼前。卡斯特從通訊技術革命和全球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角度分析指出：“網路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路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⁸ 在網絡社會當中，“社會行動者所佔有的物理上分離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複的、可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序列。”⁹ 但是，當我們不斷地強調全球流動空間或平臺的形成這一過程時，我們或許更應該看到：人是全球性也是地方性的社會關係的總和的體現者，在說明空間的全球性的同時，不能忽視人的地方性生成。這種雙重性進而提醒我們，當人類的技術手段尚未達到使人自由地進行全球流動的程度，對地方物理空間流動的實現，始終是我們討論的焦點

所在，這種流動空間的現行運作，便是我們對未來加以種種揣測的現實憑依。於此，如果過多地沉溺在技術的虛擬空間中，我們可能會不自覺地將以簡化人的豐富性：其豐富的社會性、豐富的歷史性為代價的，這樣值不值得、後果會是怎麼樣？則需要進一步加以審視。

流動何以可能？或者說如何形成促進流動空間生成的動力機制、體制乃至政策，是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受到關切的問題叢。緊接著這些問題，至少催生兩個方向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檢討，一個是流動空間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與社會整體的法治道德建設要求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另一個就是有沒有或者需要不需要推動非流動空間形態的產生？所謂流動空間的背後，大部分與利益、效率和權力運行規則相關，那麼如何厘清在流動空間中的非流動要素與流動要素之間的合理關係？在全球流動形態當中，哪些非流動的空間值得我們關注？如若繼續沿著微觀分析路徑，凝化空間自然而然地湧現在我們的眼前。

二 凝化空間

人們通常認為，時間具有不可逆性，空間具有可重複性。詩人李白曾言：“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這是對時空常識的完整概括。依於這種常識，所謂凝化空間，是指用於某種相對穩定的社會指稱或者紀念意義的空間設置，比如紀念堂、博物館和墓地等。這類空間在嚴格意義上並不是本文所謂的空間社會形態發展的必然邏輯，而是空間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富有別樣意義的重要個案，它在完成人類歷史文化延續的同時也凸顯了時空的歷時性斷裂，但它也是最能夠顯示人類自身的荒誕、模糊和敬畏之處。比如關於人物的

紀念堂，為什麼有些人物可以被凝化空間承載並作為社會標識，而另外一些人物沒有得到如此對待？這是否間接地表達某種類型的歷史不公平？又或者說，被凝化空間承載紀念的人物本身已經不具有生物學意義或者這種生物學的價值早已大大式微，其更多融合於社會的歷史流變當中，它是一種必要的社會構建，建構成社會文化的要素之一，它同時也是某種社會功能的承載和訴求使然。這就意味著，在發生個體的具身虛無化之後，被當成紀念的人物可能也會是相當無辜無奈的。即便不是虛無，那也是一種意念轉移的指認過程，由此部分地完成了人類或地域社會的文化化的傳習過程。

之所以談凝化空間，乃是因為通過這種個案，使得早已默認現代化的人們重新去體悟那種超越現代和後現代分立卻依託在人類社會傳統精神發展的脈絡圖式當中的一種永恆的懷念，基此也透視了人自身精神世界的複雜性：人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的功能而存在的，在緩慢變化的傳統社會，或者快速變化的當代社會中，讓人的精神能夠有所穩定寄託的反而不是快速變化的東西，因為快速變化的東西意味著自身也是不能保持著完整的形態和精神的信仰信念，其本身處在流變和不斷重組當中。人把自己的精神基石，或者社會把穩定的精神要素，置換在無明顯功用的凝化了的人、事、物當中，這顯然為我們展示了社會歷史延續另一方面的內容，凝化空間讓我們在另外一個層面探觸人的精神世界的複雜性以及人的社會性朝向的多維多重與內在矛盾。凝化空間無疑地，更多地具有社會整合、秩序維持和價值傳遞、精神定向等多種功能。設置凝化空間目的是為了彰顯社會性的力量對精神世界流動的在地化限制和歷時性調節。

凝化空間依然具有權力規制的等級性，即從高到低的排列，並不是因為生命個體對空間佔有的差異使然，實際相反，是在空間佔有無差異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權力的介入體現出來不同生命個

體的社會影響力的差異，並通過空間化過程體現出這種差異。這主要表現為兩種動力：一種是有名，即明確表示這是某一生命個體的居住地、活動場所，或者某一群人的歷史活動場所；一種是無名，這方面的例子就是墓地改造。造成無名或者有名，意味著某種社會的選擇，那麼為什麼會被選擇？這裡面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織，因為選擇本身及其所造結局乃是權力對個體或群體施加的社會影響，而權力可能是制度化合法化的權力，也可能是習俗和共識形成的權力。凝化空間本身就是權力的彰顯，是權力的一種空間性表達，空間是權力表達的工具，這也進一步突出了空間的政治性。又或許，反過來，是通過或者只能通過凝化空間再審視，我們獲得了對權力的類型及其影響和傳播的深刻體察，特別是對權力施行的微觀機制和宏觀建制的關係會有更為深刻的覺知。

人類是尋求意義、製造意義並延續意義的高級動物。在工具層面的空間利用、開發僅僅體現人類理性致用需求的一個方面，而人類還於感性、知性上亦有著多重的需求，也只有照顧到多樣需求所形成的一定均衡，人類才能展現其天地間最為貴的人的秉性及其完整特徵。二戰期間的德國納粹集中營，恰恰從反面說明了人類對理性的崇拜和自詡只會釀成災難性的後果。理性在人類探索自身、關於自身知識方面的助力作用是非常有限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凝化空間的形成或設置的現實意義，首先是，人類的自我認同建構，即是讓社會化的個體認同主流價值的歷史源流和民族文化共同性的價值回歸；其次是，進行有選擇的歷史整理，關於歷史故事的合理性說明和合情性疏導，乃是基於現實社會價值導向的實際需要，有選擇地對歷史人物與事件加以現實地利用和不同程度地改造凸顯，服務於現實政治穩定和合法化訴求，是現實權力的自我維護或修復的一種必然手段；最後是，凝化空間能夠彰顯公共空間的歷史和文化尺度，也即通過公共物品和公共

歷史文化的塑造，進而確認社會個體的歷史向度的價值所指，這意味著，權力的自我展示也就會附帶著公共性的自我宣稱，只有把權力實施與公共空間的拓展結合起來，才能在社會整體意義上實施權力。從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再度觀之，無論何種凝化空間，都是處於解凍的過程中。人之於歷史，正義的積極樣式才可能有著持久的意蘊，不斷地凝化和解凍的相互交織，也方能構成歷史演變的社會要義。

墓地可以說是社會個體的最後社會性存在定位的標誌。建造墓地，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死亡的社會個體的尊嚴及其影響的社會再認。這種設置背後的文化意涵異常濃烈，事死如事生，喪祭文化自古有之。墓地的文化意含甚於個體身體的生物意含。也正是這種雙重意含定位，實際上蘊含著兩者分裂的現實可能，一塊墓地的設置既可以社會性地隨意擴張，也可以靈活性地隨意縮減。在現實生活中既可以看到墓地的社會標識符所承載著的物理空間表達是相當廣大的，甚至是戒備森嚴的，墓地規模、構造和裝飾等直接言明身份、言明社會附在其上的種種寄託，世界古代的帝王陵寢便是社會性擴張的說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墓地的社會表徵僅僅只是在一個世代的現存影響當中表明影響而已，比如一塊墓碑、一個名字。當無法一一言明墓地所屬的時候，會採取更為抽象的社會指代。因此，墓地僅僅是社會對過去歷史事件影響到當代的一種紀念性的回望，更多地被賦予了教育和歷史的社會功能。此外，還有更多無名的人的墓地，在歷史時間海中，逐漸沉淪於虛無，無論其生物意義的血脈延續還是社會貢獻的歷史沉積，都隨著時間的洗滌而化解於向前翻騰滾滾的社會時間流當中。

博物館，是一種將歷史遺跡遺物以集中的方式匯合在一定的場所，是對人的空間感的歷史穿梭和全景式素描，也是對人作為主體的歷時生產和現實感受凝練而成。博物館可以視為面對歷史

的當代訴說。然而，博物館不僅僅是物的累積彙聚，這種空間集中呈現，更多帶有社會選擇和意識形態功能色彩，本質上是社會再造和歷史再造的一個雙向過程。博物館意圖訴說歷史，傳達歷史關切，但空間的靜謐、物的集聚和模擬再現，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肯定地表達了教育的意圖，但也可能簡化了歷史形成的複雜過程。因為，以後來者的結果定向和實用的表達訴求，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帶有很強的後歷史決定論的先入視野，反而是不利於歷史的複雜呈現。既然是實用的教育的功能指向，更需要著力的反而是擴寬空間的實用功能，特別是把歷史主體的體驗轉帶到現代的閱覽當中，更是有利於啟動激發關於歷史的想像，利於打通主體間性的認受，進而描繪出主體交互的共情和通感，便於回溯人的本真。凝化空間與固著空間或者固化空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繫。固化空間是為了滿足人類直接的實用性需求而建設的空間，如建築物、交通線路等等空間設置隨處可見。凝化空間並非是為滿足人類直接的實用需求而建設，它更多是文化紀念意義上為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而建設的空間。

毫無疑義，凝化空間並非純然特指諸如墓地、博物館、紀念堂等，而是指一種社會的集體的空間意識意象的投射，使之承載著特定的社會功能，這正是社會化的人類進行空間生產的一個根本性需求所在。從這個需求出發，實際上也意味著，凝化本身隨處可見，在幾乎所有的空間生產、利用當中都可以看到凝化的影像，凝化空間的構造更多地帶有主觀意象，是歷史積澱或者長期的文化涵養自然而然使之如是如此顯示。這就是說，一定時段一定區域中的墓地、博物館、紀念館等在一定的人群當中享有特殊的歷史意味，一旦超出這個範圍或時段，凝化空間必然回歸基本的物理空間意涵，即謂凝化空間在整個時間流和空間海當中享有的只是短暫的歇息以及有限的自我標定。凝化空間試圖把人類轟轟烈烈的行為固化下來，用以紀念人自身的歷史存在並展現主體

的能力。凝化空間同時也是人類空間改造能力趨於欲望靜謐時刻的自我回望。

三 居住空間

有史以來，在人類生存、生產和發展過程當中最基本的一個需求就是居住空間。這個空間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往上可以多重擴充，但往下極易觸及最基本的身體界限。人類的居住史在身體單元上下劃定了居住空間的社會尺度並在張力中往返演替。設若暫時懸置人的需求和身體界限，凡是動植物，居住空間、活動空間就一直是個不言而明的本體存在問題。相比起來，人類不一定處理得更好，相反，可能處理得很差。居住空間在空間社會視角下成為一個凸顯的社會問題域，對此可做雙重思考：一個是現實的，一個是哲學的。居住空間是與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緊密相關，同時受到家庭人口與結構的影響。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廣大無產階級的居住空間直接體現或標識該社會階級鬥爭和發展的程度。在一般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居住空間的商品化作為一種社會治理術，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社會人群的可能活躍範圍，其劃定的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直接影響著該社會的社會關係的形成與重構，充盈其間的有著多種多樣的關係類型不斷處於變化之中，居住空間反映著社會平等、社會的公共服務發展水準。

一般來說，居住空間大小和分佈受到的影響因素是各種各樣的。第一是宏觀的人口密度、結構和社會發展水準等因素會影響到居住空間的建築安排；第二是資本收益預期、土地價格和各種建築成本與社會群體一定的消費水準之間的張力關係，而這個影響因素在一定歷史時期會居於主導地位，甚至會達到極化的程

度。第三是會受到建築土地與非建築土地在某區域的比例關係而調整，這與社會資源、社會政策導向是緊密相關的。第四是會受到生育政策的影響，家庭人口數量的預期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居住房間的數量和活動的面積，進而影響到整體的居住空間安排；第五是受到社會撫養、贍養方式的影響，比如老人是在家贍養還是社區贍養，社會個體從嬰兒到兒童到少年是在家庭撫養還是整個社會撫養，未來社會是否會出現僅僅以兩性個體，或者單個人生活空間為核算單位亦有待思考；第六是傳統社會習俗的影響，這種因素在現代社會中會越來越式微，但並不代表傳統的影響已經消失，居住空間的位置、大小背後反映出一定的人群對空間文化的認識；第七是客觀的社會建築技術、建築材料等因素。

概而言之，居住空間既是客觀的，又是文化的，既是個人家庭的，也是社區社會的，是受到宏觀、微觀和中觀，社會和心理，個人和群體等各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其中何種因素會居於主導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段基於其時的社會條件一定會顯示出差別。一個可能的總趨向是：居住空間已經並將繼續納入社會治理術的範疇，成為社會控制、社會管理權力施展、改造的物理空間憑依所在。在這裡至少有雙重意蘊值得思討：一個是在積極意義上，即培育人自身解放的基本構件，將居住空間作為人的基本需求加以滿足，人人有居住權，即依託一定的居住空間，確保人的生存權，只有這個基礎有了基本的保障，才能繼續言談一個社會的或個體的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另外一個是在消極意義上，即通過居住空間的社會調節，進而壓制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而何種意義的社會政策能夠起作用乃是與社會綜合發展水準和主導力量的著力方向是緊密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下，工人階級的居住空間是追求最低限度的居住功能，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無產階級的居住空間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問題。馬克思針對這個問題，深刻地指出：“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過這洞穴現

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氣污染。他不能踏踏實實地住在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個每天都可能從他身旁脫離的異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趕出洞穴。工人必須為這停屍房支付租金。”¹⁰ 可見，居住空間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性，無產階級深受壓迫並且只能生活在非常狹小的空間中。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¹¹ 居住空間的位置、大小和裝修情況直接反映出人們的階級關係或社會階層地位。

居住空間可以劃分多種區域的，比如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區分。居住空間設計與現實化，逐漸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人們的制度意識和制度追求，即空間社會化的同時也使得社會空間化。這也就意味著，應當首先界定一個社會的追求是什麼，目標何在？從社會的基本原則出發來設計居住空間，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應當從空間意義上解放人，因而也就為人的其它維度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空間基礎。空間的解放首先就是公共空間從過度私人化的空間中解放出來，既解決了居住交往的功能整合問題，又解決了個性釋放和獨處的空間安排。在居住空間中，公共性的缺乏，反而不利於整體上人的社群特性的培育。人類自有史以來，用什麼方式把空間社會化為個人私有制？這其中如何與社會空間公共化產生矛盾，雙方的關係如何？私有制的產生是物還是把空間當物？居住空間私人化的範圍在何種程度上是符合個體所有制的，因此也與私有制作徹底的劃分？生命個體必然佔有一定的空間作為行動

的動能的發展朝向，在這個意義上，差別是生物性的，應當被允許的。但是一旦超出了佔有空間的應得性，那麼就必然產生私有制以及反抗私有制的種種鬥爭。因此，自由首先是對空間位移來說的，自由就是在空間中行動的自由，這也是為什麼監獄成為了自由的反面的空間意義所在。

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空間為個體所有制提供可能的客觀構建，但是在任何意義上，空間都不可能為私人所有制提供合法性的論證。空間的公共化只有在滿足個體所有制並限定個體所有制的情況下，才是可以接受的。或許，真正的意蘊在於，空間本質上就不屬於公共的，也不屬於個人的，它本質上不應該用從屬關係來界定、來討論。這就是說，在實際生活層面，空間極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公共的。但是經由社會關係和歷史時間的介入，個人化的居住空間可能轉化為公共的，公共化的空間也可能轉化為個人。俗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既是時間的轉變，也是空間的轉化。一定的必要的個體所有制的空間設置，是一個社會為其成員獲取社會資格的最基本權利和制度的最基本取向。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以過程論的角度說明一切都是暫時的，這是從時間的角度。同樣，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一切也都是暫居的，因而也就是沒有永恆永駐之物。正是在暫時性、暫居性這個意義上，作為主體的人要回到自身，並在自身中培育胸懷，那就是必須打破可能阻礙整體演進的過分的空間私人化或公共化，兩者之間的合理狀態應該保持適度的比例。在空間個人化和公共化之外，空間自然化也是一個發展路徑，所以，討論居住空間的討論本身，也是值得自我反思。過程，或許不應該僅僅從時間演化的角度，還可以結合空間的位移、反復等角度來思考。恩格斯指出，在辯證哲學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

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者的頭腦中的反映。”¹² 現在要思考的是現代社會居住空間的暫時性，是多長時間？是多大範圍？居住空間的公共性是被私人化、被異化、被權力控制的公共性，個體可能享有公共空間的使用，但是個體薈萃的整體從而不曾宣言對公共空間的所有權，集體所有權被各種各樣的權力形式霸佔、隱蔽。盧梭曾提出這樣一個空間命題：當有人對另外一個人說，這塊土地是他的，別人怎麼看？承認表示認同私有制或者權力，不承認表示反抗。¹³ 這個問題在表現形式上是空間的劃分，但實際上是權力的施展結果。由此反觀現代社會的居住空間，或者在集體公共空間的享用、佔有之間也必然是深刻的權力分化問題。此外，居住空間背後反映的還有一個時代的建築學的發展水準。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空間雖然可以標誌社會身份，但也可能正是通過居住空間模糊了、減緩了人的社會差別及其顯相。因為，居住空間嚴重依賴於地理位置和建築成本、裝修成本的正常化水準，而貨幣的信用透支使得購買力假像充斥在現實的世界當中，未來已高度貶值並提前簡化定向，人們可以通過消費未來進而來消費現在，人們的時間觀只有現在，因為人只能居住在現在的空間中。過去的、未來的，都只是為了轉換現在而設定成為時間的停頓或延續。人的發展理路無處不在斷裂當中，正是斷裂使得現代人深處焦慮當中，其根源就是商品化了的居住空間，商品化的勞動力個人，以及商品化的空間社會。整個空間社會的體制機制、審美、時空機制等等都以人的居住空間為最微觀也是最直觀的呈現，商品化的空間摧毀了人立足世界的根本依據，因為要立足，無空間可立談何生存發展之大本。反過來說，唯有增加或增設公共空間、公共的居住空間才能解決絕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生活需求，才能體現一個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基本所在，才能讓現實和現時的人享有人本的權利，才有可能盡其基本的義務。

人的基本空間，尤其是居住空間，應該是社會基本的公共物品供應，如果一個社會能夠為社會上的每一個人提供一處基本的居住空間而不應支付超出基本支付能力甚至不需要支付的情況下，這個社會才是一個基本的公共社會形態，這個條件的實現至少無形地規避了很多社會風險和社會問題的發生，至少能把不同社會群體帶到共同願望共同未來的軌道上來。一個人若是無立錐之地，何談為社會作更大貢獻？社會又怎能保持自由開放之本色？只有在個體居住空間基本權利獲得保障或滿足之後，商品化的居住空間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一旦人的居住空間基本權力得到保障之後，接下來的居住空間差異化最多只是體現社會成員之間的非本質差異，這樣至少不會觸及人的基本生存界限問題，這樣就能夠確保絕大多數人的生存發展之基本需求。

因此，如果要促進社會發展和正義價值的實現，我們應當考慮的是如何優化居住空間，使之充分體現出社會個體的主體尊嚴和自由狀態。整個社會的居住空間構建，應當更加著重於公共性、社區性的空間培育，單元式的居住空間佈局必將是需要批判和革命，因為它不僅導致個體的原子化，而且也私人化了，個體的生物生命無奈地寄寓特定的空間內，而社會生命則愈發減弱乃至弱化為自然生命。公共空間的建造表明一個社會公共性的發育程度，其範圍愈來愈大，愈能夠確保絕大多數人的空間需求，並減緩社會矛盾。

四 都市社會

當代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很大程度上與都市空間、都市社會研究直接相關的，也即與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城市化進程及其影響高度關聯。正是在都市社會空間的規劃、生產和顯像的基礎上，

空間作為一個現代性的時代命題躍入到人們的視野當中，並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對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意象，同時也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理論構造提出了挑戰。

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空間理論研究者如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人，實際上也都是都市社會的研究者，他們都密切關注都市社會中的空間生產、空間感知和想像，因而也都是城市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研究代表。列斐伏爾甚至提出了關於城市的哲學，他對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係以及從中世紀以來的城市發展史都做了細緻的分析。¹⁴ 蘇賈曾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空間“這一轉向在世紀年代通過不同學科的交叉得以發展，與當代人們對城市與都市重新興起的興趣浪潮密切相關，城市和都市生活現在被認為是研究和解釋……‘世界和我們的生存之謎’的研究物件和理解管道。”¹⁵ 也就是說，關於城市和都市的直接的深刻的體驗本身，就是激發空間理論思考力、想像力的重要源頭。實際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發生過關於城市特殊性的論辯。這是歷史地理唯物主義重申空間立場的重要場域，也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勃興的重要標誌。蘇賈認為這場論辯，“不單單是一項在認識論體操方面的技能訓練。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激進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兩者之間的學科性衝突，衝突的焦點是社會理論的空間化和對空間的重申到底被允許到何種程度。”¹⁶ 蘇賈所謂的空間化三條路徑分別是：“後歷史決定論”、“後福特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其中“後歷史決定論”主要從本體論方面對社會存在的本質和概念化進行根本性的重塑，力圖平衡歷史、地理和社會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後福特主義”直接附麗於資本主義的“第四次現代化”這一物質世界的政治經濟學；“後現代主義”寄寓於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變革以及後現代文化的崛起。也就是說，從社會歷史發展演變的本體論視角，再到

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再到以後現代文化為核心的後現代主義闡釋路徑，空間作為一個內在化的統一的歷時性勾連，生成於對社會現實的不同敘事之中。城市、都市社會可以也必須作為一個切入點，基此從更為宏觀、或者更為突出的場域中拉起整個空間敘述的景觀。有研究分析指出：當代人類實踐、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以及當代都市化背景型塑的國際政治格局等方面的多重作用，使得空間問題成為當代問題研究中的重大問題。¹⁷ 都市空間實際上一直是人類社會歷史演進過程中不斷被思考的一個基點。

不可否認，無論是從經驗直觀的意蘊，還是從現代性動力演變的理論思辨和參照上，現代社會發展，特別集中體現在大城市、城市的發展水準模式和特徵上，城市是現代社會的現代意涵所在。“地理是區域經濟增長和城市體系演變的決定性因素”¹⁸，城市是理解現代文明的重要視窗，城市不僅是經濟、政治，也一般是文化的中心，不僅僅是物質文明的集中體現者，也主要是精神文明的集中體現者。不僅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社會主要勞動力集中的地方，不僅是年輕人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一個社會創造力、創新能力轉化現實的重要場所。城市乃是現代主義的動力機制所指。但是我們還應看到，即便如此，城市也是在與現代化，特別是在與農村發展來比較的潛在視野中獲得了身份的自我證明。嚴格意義上說，城市只是一個社會的縮影，只是一個與農村相比較而存在的社會設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城市、都市社會的提出本身就蘊含著現代的空間治理，也即最寬泛意義上的空間區隔要求。都市社會催生了理論現實主義的空間重申及其認識論話語的重建。空間治理早已演化成都市社會治理的核心命題。在早期的芝加哥學派當中，派克等人提出了區位生態學，就是用以研究城市社會的空間治理，分析不同城市的空間

社會佈局，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基層分化現象。此後關於都市社會的空間結構常常淹沒在功能型、生活型、工廠型等有關空間類型的討論中。毫無疑問，都市社會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下會有不同的空間結構。

在空間社會視野下，空間結構和空間治理成為了突出命題。都市社會脈聯於城市化發展戰略，是城市空間戰略的主要目標。但是都市社會區別於城市化的核心特徵在於：都市是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城市化表達的是一個過程，而都市社會表達的是一系列體制機制運行的結果，是在凝結和現成的意義上，都市社會成為了理論對象和操作場。因此基於空間社會的視角，在這裡更多從一般意義來揭示空間社會鍛造與其深度的歷時性影響。都市社會的生態，至少有三個效應值得關注，首先它發揮著內聚效應，它把很多要素吸引、吸收並結合，轉化為現實的改造過程，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相關問題和矛盾，如人口集聚後引發的居住空間、社會秩序和生態環境等問題。其次是它發揮著擴充效應，它不斷地向外圈溢出，不斷把其周邊地區空間進一步有意無意地納入城市化進程，並使其屈服和服務於中心城市地區的各项需求和社會安排。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反復地形成以城市中心區的中心化和去中心化雙向過程。所謂去中心本身就是建立新的中心的過程，各種資源、要素、人力等的流動和集聚規律都是以中心趨向為準則的。最後是它還發揮著疊加效應，也就是無論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種種要素，都以不同方式、機遇奇怪地互相疊加在一起，體現了區域空間社會的龐雜和多元。在中心、半中心和邊緣地區，既可以找到最先進的城市化要素，也可以找到最落後的傳統社會要素。在忙忙碌碌的都市人身上，既可以找到最先進的城市元素，也可以找到最落後的元素。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都市社會發展過程當中，現代城市化已經催生了大都市群等區域化發展戰略。大都市群戰略

實際上是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縱深，大都市群形成更大的中心、更大的邊緣，更多的中心，更為廣大的邊緣地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單個地區的城市化已經不滿足於促進有限的現代化進程，通過已有城市體的整合彙聚效應，特別是在整體和宏觀上促進都市社會的功能分化和轉移，將一部分生產性的功能轉移到城市群的周邊，但仍屬於城市管控範圍，這樣子就為都市中心的生活樣態轉型升級奠定了空間佈局的基礎。城市群發展戰略是空間生產的進一步升級，加速了空間生產的歷史進程，同時也催生更多的強制性推動力量，人口流動、教育資源、產業資源、生活資源進一步整合轉換。城市群建設高度依賴於現代科技，特別是交通和通訊技術，後者使得資源的多向流動成為及時和共用的。在哈維看來，這種大都市群規劃建設或者泛區域性的建設，“它反映了人們對於日新月異的城市規模的理解與想像（the changing scale at which the urban is being thought）。城市不再是中世紀那種相對密集、被城牆環繞的封閉空間，而是開放的、不斷擴大的廣闊空間。城市必須被重新定義，以適應極速增長的資本積累速度，滿足為資本尋求投資機遇的需求。”¹⁹ 即城市群或者區域化戰略擴大了深化了人們對城市的理解與想像，城市需要被重新定義來滿足資本積累和機會創造的需求。但這只是反映其中的一個方面，城市群戰略更為深刻的意蘊在於：消除區域不平等，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整體上推進城市化發展水準，進而化解城市中心論，同時又建構一個更大範圍的城市發展意象。與此並行不悖的是，都市社會是一個以塗爾幹所謂的機械團結為基礎的共同體，它的背景依然是社會轉型或者社會過渡，是傳統和現代社會交替的混合物。即無論何種規模的城市發展規模，社會關係的發展類型及其可能的現實展開和影響，乃是需要更加予以關切的地方。

五 全球社會

“全球化空間是當今世界的新的空間邏輯。”²⁰ 自近代以來，特別是在以資本主義為現代化動力機制推動之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實現了前所未來的發展。及至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作為一種促進世界發展性的動力與資本主義交織並存。這兩種動力機制之間的矛盾及其歷史演進，分演空間社會達至全球空間生產的喜怒哀樂。百餘年來，一個帶有片面性的全球社會形態逐漸在生產力、科技革命、資訊革命中發生發展。“全球化空間，是在日益深刻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空間理論建構的嘗試。它實際包含兩個理論成分：全球性和後現代性，這兩個成分在全球化空間論中是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的。”²¹ 這主要表現在，全球空間諸如場所、地域和全球化之間相互滲透、扭結和排斥，資訊化、網絡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新空間相互交織。應當承認：一方面，人類社會的不同地區、民族、群體乃至個人之間的聯繫和溝通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密，全球空間被整體人類所感知；另一方面是問題的全球性，也即如生態環境問題、恐怖襲擊問題和金融危機問題等，都會引發全球性的反應和震動，因為“全球化種種過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循序漸進的空間隔離、分隔和排斥。”²² 也即全球化過程伴隨著全球空間化的不平等，這是資本動力的全球化的片面性所在。最後是一定數量的全球個體深受全球文化潮流的影響，並且積極關注全球性事件與其影響。全球化與本土化雙向並進，相互交織又相互排斥，全球化進程在矛盾中前進，也是在矛盾中鍛造出一個全球社會。在今天的全球社會當中，資本依然是主旋律，是核心要素，在這個主旋律的炫動下，空間的生產造成種種不平等又負擔著種種不確定。“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結果就是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

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而不平衡的發展。集中化與分散化之間在歷史上有名的緊張關係，現在以各種新的方式產生出來了。”²³ 在全球社會發展過程中，充斥著各種效應及其爆發的可能，蝴蝶效應如灰犀牛事件、黑天鵝事件，反映著全球社會的內在密度及其這個社會的內生脆弱。尤其是全球性危機非預期地侵蝕，使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危機當中。究其本質而言，全球社會就是一個高度關係化的社會形態，本土與全球，一域與全域，不停地相互穿梭。正如福柯所言：“我們生活的空間是一個關係的總體，不同位置之間的關係是不可消除、不可公約的。”²⁴

但歷史吊詭的是，對全球社會的形成的感知和意識確認需要一個過程，這意味著，空間社會中的時空機制與其它機制交織在一起，共同促進社會形態的演化。很多時候問題的關鍵恰恰是對全球社會形態本身的感知起著至關緊要的作用。因為，事實上，自人類產生以來，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整體，但是局部的重要性遠遠重要於人類社會的整體性。乃至今天，一些局部問題對於身處那個地區的人群，更比人類世界的各種整體性問題重要得多。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們之間社會關係的日益緊密，局部重要性和全球責任之間的動態關係不斷縱深。但在實質意義上，全球公民意識的培育，只有到全球個體的基本權利得到制度性和社會性的保障，只有在生產資料歸屬於整個社會所有，生活資料在以社會為導向的共產主義制度安排中才有可能徹底實現。因而，只要是不平等的私有制依然存在，全球社會就很難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和責任的共同體。因為私有制多層化必定意味著衝突並且只能以衝突的方式來解決，人類社會整體上又會陷入衝突的死結當中。全球化背景下私有制發展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固化了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平等，以致這種固化過程嚴重阻滯了全球個體所有制的形成和發展，最終必定引起各種形式各種程度的

反抗，而能夠進行這種反抗政治的，可能也只是擴大了的個體結合的利益組織，反抗本身凸顯利益又為利益所覆。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全球社會真正為現在的我們布展一種未來的圖景。但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社會，我們依然任重道遠，而之所以任重道遠，乃是因為全球社會構建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雖然以問題為基點固然能夠喚醒全球社會責任，僅憑這一點來證實全球社會的現實可能，即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不夠全面，不夠深刻的。因為，全球社會的另外意蘊在於：它是積極的正面的，因而也是正義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種非完整性的全球客觀形態只有喚醒或者符合全球個體的某種共同的期待，才有可能被推動並朝前發展，要實現這一發展，又必須擺脫對全球個體的束縛，但這種消極意義的擺脫並沒有回到完整的人自身主體的建構，還沒有回歸到人自由自在全面發展的人的積極樣態中。在表像意義上講，全球社會是空間社會外張式形態發展的一個闕限，因為全球各部分已經被納入到一整個社會公共性認知和約束當中。但在實質意義上，全球社會必定在內斂密度上逐步發展到緊密銜接的程度，而虛擬式形態就是這種密度的現實表現。

從空間社會的時空機制來說，全球社會是一種歷史狀。它意味著生成，人們雖然可能沒有這種整體的歷史生成意識，但是客觀現實是外在強制性和條件性的，畢竟人類所依託的物理地理空間是共同的，空間實存的壓迫性直接構成了存在本身，進而使得存在者將龐大的物理空間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支撐物，而事實上這種全球社會狀態的感知是需要話語的喚醒和語境的感受。此外，全球社會是一種現實狀，更多意味著問題，因為問題威脅著整體人類的生存，也因為為了解決問題，才想起人類的整體性，才能把對問題的克服、解決看作是朝向未來、定位全球社會的重要基點。全球個體所處的直接現實首先受到局部性的積極的現實環繞，但是當一定的全球性問題衝破了局部的限制，那麼全球社

會問題就直接對著每個人的生產生活，問題就更具有全身影響特徵。最後，全球社會也是一種未來狀。意味著生產力、通訊技術和社會關係的多維多層革命。全球社會的理想狀態是為著更好的全球個體的生產生活而服務的，是為全球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而面向的，但是未來朝向意味著更多的共同體建設工作，基此進而實現一個富含利益、責任和命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推動和構建，這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全球社會形態，誠如習近平所定義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²⁵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它的實現端賴全球各類主體的合力生成與歷史萃集，亦需要一個長期的奮鬥過程。

全球社會是多樣態的，也是非均衡的，它可能會是以通訊技術、交通技術為核心的全球技術社會，但這種全球社會層次是脆弱的，甚至可能是全球社會的假像。也可能是以經濟活動為主要特徵的全球經濟社會，這種全球社會層次是片面的，因為經濟利益往來所可能表明的共同體是暫時性的。只有出現以全球命運為核心的全球文化社會，才可能確證堅如磐石的真正共同體的全體社會。要理解全球社會的歷史演進和未來發展，可從空間生產的發展來理解。有論者指出，“空間生產的歷史發展狀況是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的特定表現。與古典社會和現代社會發展階段相比，當代空間生產展示了新的基本特徵和發展趨勢，表現為空間生產的異質化、特色化、高技術化、生活化以及市場化等各個方面。空間生產的當代發展狀況是與資本形態的創新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資本的當代創新發展造就了空間生產的當代特點。”²⁶ 全球社會正是在當代空間生產的新特徵中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然而卻是由資本形態的當代發展邏輯所推動的，這是全球社

會形成過程的陣痛所在。為了新生，忍受劇痛，謀劃好未來，一方面，要形成全球社會必須依賴一種全球性的機制運作使之關聯互動的內容豐富和速度加速；另一方面，又因為這種全球化的機制運作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多種負面的效果效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球社會中的空間正義是最為突出的空間倫理問題，因為任何正義的行事或思想，都是在一種全球社會業已推進的當代形態當中具有了全域思想的整全可能。人類世代所期許的大同社會正是一種全域無外的全球社會，人類整體構成了生死相依、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一種取驗於人類社會整體的總體性的哲學就此鑄就，也即人類的類意義上的哲學，即關於人自身的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取向的思討，不再依靠個體的冥想和局部的想像，人類整體性已然是一個存在且可以觸及的本真事實，儘管這個事實總體還在許多方面差強人意，但是一種有關空間正義的唯物史觀敘事便可以而且必須是當代現實，全球性即是個體性，個體性就是全球性，全球無外的天下體系不期而至，儘管另一方面反映的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是至關緊要的。但事實是，空間社會的鍛造在全球社會形態下已然是一個難以超越且必須探觸的現實界面。

六 星際社會

時至今日，浩瀚無際、絢爛多彩的太空，已不僅僅只是人類的想像翱翔之域，同時也是人類的可接觸領域，人類的太空行動，有意無意地打開了社會構建系列的一種新形態。本來外在於人類、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太空，逐漸被納入到人類社會國家主權的干預之地，人類進入了太空時代，即一個將太空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主要標誌的時代拉開了序幕，星際社會也隨之款款而來。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開啟了人類探索太空的新紀元。隨後，許多國家競相加入了探索太空的行列。根據有關統計，目前，全球200多個國家當中，有12個國家具備航太發射能力，有70多個國家擁有自己的衛星。截至2019年3月底，世界各國在軌衛星2062顆，包括432顆軍事衛星，其中美國衛星總數與軍事衛星分別為901顆和176顆，總占比約為43.7%；俄羅斯為153顆和93顆；中國為299顆和99顆，總占比14.5%。²⁷ “宇宙公路”、“月球太空港”、“月球賓館”、“宇宙巡迴航母”等太空設想都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人類太空技術的不斷發展成熟，開闢了繼陸地、海洋、大氣層之後的第四個空間，使得太空成為國家間博弈的新疆域，”²⁸ 技術的更新升級，權力的介入渴望，使太空不僅僅成為人類探索未知、反觀自身的神奇領域，而且也成為人類內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權力爭奪地。太空政治化、太空領域軍事化、太空武器化、太空爭奪戰甚至星球大戰，一時間愈演愈烈。毫無疑問，太空已成為國際戰略競爭的制高點。與此同時，人類的太空技術、太空探索為返觀人類自身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新的可能。有研究者進一步指出，人類已經超越“全球化”，進入“世界化”，一幅“星際社會”的巨幕正在緩緩開啟。²⁹

星際社會是地球政治的空間延伸，是人類整體意義上的空間政治學，也不難想像，今日之世界乃至以後，一個明顯的趨向表明權力的最高形態在於爭奪外太空的制導權。地方權力的相互鬥爭，充分體現在對外空使用權的把控和相關管理規則的制定上，這也是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的最高級形態。地球空間生產是一個逐步外移擴大的過程，先是在地球空間上建構一個封閉性的整體社會，而後在地球圈的周圍建造可能的星際社會，然後向外不斷擴充演化不同形態的星際社會。因而，空間社會的高階形態就會在征服外太空中形成並演繹星際社會的生死愛欲。

星際社會，主要是指人類外在於地球而建造的一種社會形態，是人類社會性內涵的技術性延伸。就目前而言，星際社會是我們關於空間社會發展的一種未來想像。它是一種暫時未完全出現但未來極有可能完整出現的空間社會個例。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星際社會不僅僅具有理論想像和實踐展望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借鑒、反思和批判的意義，當然，它也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參照意義，同時也具有本體論的潛力發揮或者極限思考的意義。

我們可以設想：未來社會發展的某個歷史時期，人類憑藉高科技擺脫了對地球空間的束縛，從而發展到對太空空間的開發利用，並在某個星球重新建立人類社會形態。這些社會形態與歷史以來的人類社會構造是緊密相關，儘管會有很多不同，而這些不同更多地是受限於空間開發技術以及人類自身生物屬性的限制。對星際社會的開發拓展乃至全新的構造，表面上看是人類主體實現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自由，人類可以在星球體系中遊動，享有充分的空間位移自由。但實際上，人類整體脫離人類自身作為動物個體所能承載的生物動能極限，因而在太空中反而可能顯露出人類更多的不自在，更多的不能自我做主，本體意義的脆弱性在真空中顯露的也更加徹底。因為人類畢竟是靠技術手段實現的對外空間位移，而技術手段本身也無法完全確保無縫搭建人的欲望與外在空間條件限制之間的關聯。

顯然，星際社會在這裡更多具有理論想像的意義，在想像力遨遊的海洋當中，它讓我們去思考，在一個日益緊密的全球社會可能具有的外溢效應。因為，社會的緊密聯繫與個體的孤獨自覺在聯繫網路中會表露後者的特性特質越來越突出，一方面是技術的集體性，另一方面是感知的個體性，每個人都像漂在茫無邊界的海面上，海水是共同的表面，而個人小舟總有傾覆的可能。人類個體像似在流浪，就如整個地球一起在流浪一樣。這看起來很美，實際上也許很現實，因為畢竟人的直接現實性就

是實踐本身。可是一旦星際社會的建構存在現實可能性，那麼就有可能重新顛覆歷史性的思考，因為進入星際社會，人類自然而然地脫去了地球外在歷史影像的腐蝕效應，儘管星際社會需要歷史性重構和進一步的文化累積，但畢竟享有從所未來的文化創生自由。一旦星際社會的建構得以實現，哪怕是由一部分人加以實現，關於空間社會的生成、形態、機制和境界等論點論域，都需要重新加以評估評價，這至少或者主要地要告訴我們，任何理論普遍性的宣稱，總可能在真正的界限面前要重拾謹慎的姿態和謙遜的返觀。再深刻的思考，總有機緣陷入無語凝噎的時分。於虛無中滋養的時空特性最終是默默潛入人的意念深層，由此托起了人漂浮在風中的心境。

但如果我們從一種移民太空生活的科學幻想角度來反觀空間社會的觀點，更有可能觸及了空間社會的異質性要素、生成的基點與多向發展的潛能。面向未來，星際社會在想像的空間中是允許也是可能的，而這種允許是與人類太空科技水準是直接相關的；而這種可能也是與人類自身擺脫自身束縛的內在衝動是必然相關的。這個時候，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空間社會的形態更多會顯示出同質性、技術依賴性以及文化單一性。同質性在於移民某個星球可能是某一個類似或相同背景的群體，高度依賴於航空航太技術，因而在其所落地的星球中會呈現文化單一性，這是大部分星際社會拓展初期的可能形態學特徵。

星際社會對人的生產生活的方式會提出新的挑戰，並有可能使人類回復到一種對人的依賴性和對物的依賴性相結合的一種混合型生產生活狀態，這種生活狀態對人的主體地位重新提出了質疑，並激發了新的發展可能性。我們滿懷期待另外一個關於空間社會的敘事，或許就是對現狀不滿的空間折射，但僅限於此遠遠

不能自足，一種開放的空間敘事，首先需要回應的就是現實改造的必要，對全球空間正義的呼籲，便是其中持久的回音。

小結

空間社會的個例分析過程是一種把具體和抽象相結合的整體性分析思路。本文主要探討空間社會下的多種個例，這些個例無法窮盡空間社會各個層面的表現，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明空間社會的多樣化形態。某些個例在現代社會以前就已經存在並發揮著特定的社會功能。不過，在現代化空間生產、消費邏輯推動之下，人類社會空間的生產、消費、分配過程深受經濟價值、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導引，比如居住空間的變遷和都市社會的演替背後是資本邏輯的推波助瀾。全球社會是空間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這一社會形態的發展直接表明了空間社會的時代性和特殊性。而星際社會作為未來空間社會發展的某種構想，主要是基於空間社會的現實狀態而展開的一種空間學想像，其合理性有待時間、也有待空間的檢驗。對空間社會個例及其想像，毫無疑義地表明空間社會視角的積極意義和自我界限。

注釋

- 1 參見朱亞坤：《試論空間社會的生成機制、歷史形態與多重秩序》，《社會理論學報》第十八卷第一期（2015）。
- 2 參見馮雷：《社會空間的成立及其不同形態——人類學哲學的視角》，《哲學動態》2014年第11期。
- 3 [美]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4頁。

- 4 孫九霞、周尚意、王寧、朱竑、周大鳴、甄峰、劉行健、楊晶晶、陳敬復、楊茜好：《跨學科聚焦的新領域：流動的時間、空間與社會》，《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
- 5 吳越菲：《邁向流動性治理：新地域空間的理論重構及其行動策略》，《學術月刊》2019年第2期。
- 6 閔婧：《卡斯特的流動的空間思想研究》，《哲學動態》2016年第5期。
- 7 《等待戈多》是一部荒誕派戲劇作品，作品描述了幾個人在荒郊野外等待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戈多出場，沒有情節、沒有動作，人類顯得飄零、孤單，在空間茫茫中期許社會的介入，表現出對人類思想的自我反思（參見[愛爾蘭]薩繆爾·貝克特：《等待戈多》，施成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 8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誌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34頁。
- 9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誌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84頁。
-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3頁。
-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5頁。
- 1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 13 參見[法]盧梭：《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87頁。
- 14 參見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p. 86–93.
- 15 [美]索亞：《後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鈞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頁。
- 16 [美]愛德華·W. 蘇賈：《後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07頁。
- 17 皮家勝：《空間問題的類型與形成原因》，《哲學動態》2015年第5期。
- 18 陸銘：《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5頁。
- 19 [美]戴維·哈維、周憲、何成洲、尹曉煌：《空間轉向、空間修復與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學術研究》2016年第8期。
- 20 馮雷：《理解空間：20世紀空間觀念的激變》，北京：中央編譯局，2017年，第178頁。
- 21 馮雷：《當代空間批判理論的四個主題——對後現代空間論的批判性重構》，《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 22 [英]齊格蒙特·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郭國良、徐建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頁。
- 23 [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70頁。
- 24 [法]M.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
- 25 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0頁。
- 26 莊友剛：《空間生產的當代發展與資本的生態邏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3期。
- 27 徐能武、高楊予兮：《太空安全秩序構建中的體系壓力與戰略指向》，《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 28 鄭華、張成新：《太空政治時代的國際競爭與合作——基於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發展的分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 29 薛惠鋒：《從地球走向太空：跨越大氣層後的未來布局——在第十九期錢學森論壇暨2019長沙空間信息產業國際博覽會上的報告》，《中國航天》2019年第11期。